

## 中国现在与未来的经济问题

金森俊树

### 内容

导言		72
1.2	在中国的收入差距与贫困	72
2.4	在中国的外国投资企业:共同合资或外国独资?	74
3.6	对于中国外汇存底累积的牵连	75
4.1	港元的命运	77
5.3	重新思考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 (1)	79
5.4	重新思考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 (2)	81
6.7	对老化的中国将是重要的第 11 个五年规划时期	82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aper are the views of the author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 or policies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Names of countries or economies mentioned are chosen by the author/s, in the exercise of his/her/their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Institute is in no way responsible for such usage.

## 导言

这篇政策摘要主要是以最先发表于亚洲开发银行研究中心 (ADB Institute) 电子刊物 e-Newsline 未来发展系列 2005 年 3 月到 2006 年 3 月文章为基础。这也被视为在 2004 年 12 月所出版的政策摘要 No.13 “中国和中国香港未来具争议性的话题”的续编。在这里所提起的文章并不一定是理论性或技术性的,而宁可说是作者试着为中国现在与未来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以不同的数据和一些分析的观点,提供给政策制定者以及对中国和亚洲地区感兴趣的一般读者。

### 1.2 在中国的收入差距与贫困

许多中国观察者现今意见一致地认为,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在都市与乡下之间以及其中各个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悬殊。事实上,中国主管当局也敏锐地了解这一点。并没有许多精准以及可靠的指标来显示中国贫富差距的情况,但是当地专家已经做了一些评估。依照他们的评估,在 1990 年东部地区的平均收入比西部高 2.1 倍。在 2003 年,此差距更扩大到 3.24 倍。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一个著名的指标来表现收入差距的等级,而在中国全国性的基尼系数在 1995 年的 0.39 增加到最近的 0.48 – 而这已经大大超过国际性所认定的 0.4 警戒标准。如果我们仔细看细目分类,乡下地区的基尼系数从 1995 年的 0.34 增加到 2002 年的 0.37,同时期都市地区的系数更急速从 1995 年的 0.28 上升到 2002 年的 0.32。显然地,贫富差距在都市地区中更扩大了。最近由国家统计局所发表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了这一点并且公布都市地区的贫富差距增加了 11.8 倍,当个别地对照 1996 年及 2000 年的 4.16 和 5.7,这

的确是一个明显的增加。劳工局也公布 10%富有的人拥有 45%的都市财富,而 10%最贫穷的人当中只拥有 1.4%。

迅速的经济成长已经减轻中国在某些程度上的贫困,无疑是一个事实。中国官方公布 – 或许是基于它自己的定义 – 在乡下地区的贫民人口从 1978 年的二亿五千万减少到 1999 年仅剩三千四百万并且乡下的收入从刚开始的经济改革至今已增加五倍之多。然而,世界银行相信以中国自己的标准为基础,仍然有二亿左右贫穷的人。由整体来看较公平的说法是来自邓小平受争议的座右铭:“让一部份的人先变成富有”,虽然贫穷人的生活稳定地改善,但是贫富差距仍继续扩大。换个角度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情况已经在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过程中,但在同时,收入差距已到达社会或许不能够再负担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预测未来中国的收入差距以及贫困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下列事项。首先,只要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还在持续进行,由于收入差距所上升的社会压力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然而,为了要达到此种状况,中国需要持续现在并不寻常的高经济成长,而这或许并不一定能够维持而且更可能会由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如过热投资及环境考量而使接下来的几年减缓成长速度。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采用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此假说主张基尼系数到达其最高点(或显示一个反 U 曲线),而国家担心当时只达到中收入阶段,而之后当成为高收入国家时,基尼系数将会往下降。

基于此种原因(虽然假说并不完全被一项实证研究所证实),我们可以主张现今中国正从低收入朝着中收入阶段前进,而其基尼系数则倾向急速地上升。因此,中国或许能够期待收入差距的问题能够在中期到长期的时间里被有效地解决。所有的这些似乎指出,虽

然至少在短期,中国无法避免收入差距的问题并且可能不能等到库兹涅茨曲线达到其最高点的时候。也许这些方法不但能提升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率而且更能直接指出贫穷差距,而这将减少贫困并且能使“效能”以及“公平”兼容(2005年11月22日)。

## 2.4 在中国的外国投资企业:共同合资或外国独资?

在中国有三种外国投资企业类型称之为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过去中外合资企业大略占了这些企业的一半,而外国独资企业所占比例约 30%。然而,自从 1990 年代后期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 2001 年,外国独资企业的数量急速地增加。总计外国投资企业的比例在 2003 年被公布已到达了 65.5%,而中外合作类型现在已不被重视。

日本公司亦无例外。在过去中日合资企业以及日本独资企业的比例是 60:40,但是自从 2000 年开始比例改变为 30:70。100%日本独资企业在中国已逐渐成为主流。而在中国的独资企业增加的原因是因为自从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主管当局对企业被外国完全所有权化的态度软化;地方政府甚至已经开始欣然接受此情况。举例来说,过去外国独资企业被要求将所有产品销售到中国以外的目标,但是现在他们只被“鼓励”这样做。为了响应这种情况,跨国公司开始追求成为独资企业来避免与中国合伙人之间管理上的冲突。世界贸易组织进入后,他们现在也提高在中国市场的信心。

各个类型的外国投资企业有什么优缺点?合资企业的体制和管理是以合资企业和公司管理法为规范,外资只有些许自由。尽管并没有条例强制加诸在外国独资企业上,为此,对批准外国独资企业的设立,中国主管当局宁可采用较紧缩的政策。合资企业仍然能

够利用他们中国合伙人与政府和其它机构各种的关系。他们也能够利用国内合伙人的销售部门网络在中国市场贩卖产品,而这在众所皆知困难的中国市场中,对做生意方面是一个有价值的优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外国企业尝试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由外国拥有的企业--试着购买国内合伙人的股份并将合资企业转换成完全的外国所有权或只是取得一个现成的国营企业。

中国主管当局似乎准备好接受这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当跨国企业的商业活动正变成越来越无止境,而且国家本身更进一步追求一个开放的政策,而这最终应该亦对国内经济有所贡献。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在此时应考虑的最重要的议题可能是如何鼓励国内企业去发展他们自己的技术并提高他们的国际竞争力,既然过去与外国合资的企业并不一定导致技术转移。除此之外,中国需要挑出对国际性可能是敏感或者是非常弱的部门;基于此考量,它可以做出详细的时间表来让外国独资企业进入这些部门。当然中国不应该从事保护贸易主义,但是它一定要避免使国内经济遭受任何严重或致命的影响。(2006年1月4日)

### 3.6 对于中国外汇存底累积的牵连

外汇存底开始在早期 2002 年急速流向中国,到去年底之前几乎到达八十二亿。这主要地归因于三个因素: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现顺差,经由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资本流入,以及预计人民币升值的中国资本回流 - 反映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疏忽遗漏。

并没有清楚的理论上的程序来决定外汇存底最理想的标准。然而,现在每月进口的外汇存底的比例大约是 16:1,而且外汇存底对短期外债大约是 10:1;两者都分别地比三个月为期和一年为期待广泛承认的数值来得高。相较于其它国家,中国外汇存底到外债比

例排名第一,以及排名第五的进口外汇存底及国内生产总值(GDP)外汇存底(而且,最近外汇存底将近50%的来源来自外国直接投资(FDI))。

中国目前正在试着解除资本账户交易并且鼓励中国企业往海外经营(走出去)。在这些环境之下,急速涌入的外资可能会忽然地停止或甚至反向流出。因此,特别在亚洲经济危机快结束时,为因应突然或无预警的资本外流的情况,能够了解为何中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倾向累积其外汇存底超过所认定最理想的标准。

根据经济理论,最大的隐忧是货币牵连。在正常的环境下,如果外汇存底流入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会释出等量的当地货币进入国内经济。当有一个外资急速涌入时,如果有太多货币被投入到市场,会有经济过热的风险。在过去几年内,不论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使用一种“消毒政策(sterilization policy)”来成功的管理货币供应量。暂时不需要预先为涌进到中国的外汇存底担忧,不论在总额上或是速度上。然而,中国主管当局需要谨慎考虑以下议题:

- (i) 外汇存底的迅速累积反映国内经济的总体国内储蓄投资不均衡(Investment-saving imbalance, I-S imbalance),尤其是外部均衡。政府引进人民币汇率系统改革计划,但是试着使用外国汇率介入,来减轻大规模汇率调整;结果是造成一个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 (ii) 一个恶性循环已经造成,也就是,外汇存底的累积引起进一步的预期人民币升值,而造成外资涌入,并且使外汇干预。
- (iii) 消毒政策有一定程度的费用牵连。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银行账单的利率已经保持比美国国库账单利率还低,这是大部份存底被投资的地方。然而,如果仰赖有关国内和外国汇率的未来发展,是无法维持的。

- (iv) 中国近几年来已达到强而有力的 9-10%经济成长,而这是需要货币供应量成长到一个相对较高比例。然而,一个适度的 6-7%经济成长率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期间是可预见的。为了要避免经济过热,货币供应量也必须成长到一个更适当的利率。

为了中国的经济,该如何利用大量的外汇存底累积,这是所有里面最重要的议题,而且并不单纯地是中国的问题,同样地其它的国家也面对一样的困境。然而,目前中国的情形,国内的经济似乎并没有从外汇存底的涌入,获得特定的利益。

在 2005 年后半段,政府从外汇存底注入总额六百亿元到国有商业银行来加强它们的资本基础,这是中国考虑将资本挪用的预兆。如果是这种情形,就需要一个计划性拨款的成果,如拨出存底来为项目创造资金,像是环境的问题,促进能源节约以及提高科技的改革。为了要避免风险而且使回收利润达到最大效果,一份现行外汇存底投资组合构造的评论—大概有 60%美元债券和财政部债券,20-25%欧元和 15-20%日圆—也可能被需要。(2006 年 3 月 22 日)

## 4.1 港元的命运

2005 年 7 月紧接着在人民币估价之后,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由代理财政司司长 Stephen IP 先生发表了一个公告,内容中陈述“政府全然没有意图改变长达超过 21 年,将香港服务得很好,而且已经是我们经济安定支柱的连动汇率系统”。港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现在在狭窄有限的波段中波动。

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停留在美元(USD)固定系统的决定在短期内显得合理。贬值的港元(HKD)与人民币相比较,被期望对中国香港(HKC)经济保证复苏有所贡献。中国香港经济也已经从来自大陆逐渐成长的观光事业中获益。中国香港经济专攻包括银行业,有价证券,观光事业和不动产的服务。被汇率变动影响的国际竞争能力不会那么猛烈地冲击这些服务部门就如同它们冲击制造业一般。

在 1983 年被中国香港采用的货币布告系统依照三难困难理论(trilemma theory),是一个资本流动自由的固定汇率,并以失去货币政策独立为代价。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政策受美国联邦政策的管制比中国中央银行政策多。然而,假设缺乏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在国际资本流动上的严厉规定和在大陆的财务系统不成熟,维持港元现状来继续利用中国香港做为一个国际性的财务中心仍是十分重要。

由于在 2005 年 7 月适度的人民币估价,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决定吸引了一点注意。重新估价是朝向一个有弹性并可完全兑换的人民币前进的第一个步骤。不久随着重新估价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函以扩张外汇贸易允许人民币和外国货币的互惠信贷交易。当中国人民银行在未来面对更多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这些会是清楚的指标,并且会感受到提供给参与者更多风险界限手段的必要性。

经济整合中国香港和大陆,尤其中国南方地区,将会加深更多港元在中国的流通。当人民币变得更有弹性而且成为具有完整的可兑换性货币,更多的人民币纸钞将会在中国香港流通。未来,中国香港和北京可能需要再访有关香港金融管理局执行长 Joseph Yam 先生所陈述的“一个国家,二个货币,互相独立的二个金融体制

以及二个金融主管当局”。中国香港和北京可能考虑再次限制人民币,废除港元或根据交易成本,货币替换以及政治及经济的因素创造一个包含中国的理想货币区域。(2005年10月3日)

### 5.3 重新思考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1)

自从2004年后期,一些争论关于中国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毕业”,已流传在日本以及中国的主管当局之间。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在过去25年来的金额大略为三兆四千亿日元,或大约是从外来国家所收开发援助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日圆贷款占日本援助的90%,而且其余的人已经给予赠款和技术上的合作。大部份的援助都被花费在物质基础设施如港口、铁路、机场和开发煤和油。

在决定日本对中国是否应继续其政府开发援助,第一个疑问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中国在地区日渐扩张的军事力量。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特许状在2003年8月被校订而且现在第一次,清楚地陈述了政府开发援助的目的在于“帮助日本自身安全和繁荣”。然而,一些日本人主张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提供中国的军事发展。的确,自从1990年代以后中国一直在尝试将它的军事设备现代化。然而,这个现代化主要是针对替换陈旧的军事设备而且重建及重新分配过多而无效率的军事人员及其它的资源。事实上,中国公开宣布这几年国防费用对总财政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非常稳定,分别在大约8-9%和1.2-1.7%。

无疑地,对于被宣布的国防支出数字是否可靠而且是否揭露出整个状况是另一个困难的疑问。举例来说,美国五角大厦在其2005报告中估计中国真正的国防开支可能是官方公布数字的双倍或者是三倍。2005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也提及了中国在军事开支

中缺乏透明原则而且对有关中国军事设备现代化亦表达了其忧虑。中国热切盼望成为世界领导国家之一而且加强它在经济上以及政治上的影响力(虽然不太可能以他的军事力量作为一张“外交卡片”)。然而,中国也答应继续它的改革以及在政策上对外开放。此外,它正在为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以及 2010 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做准备。中国也已经开始采取一些多边协商来稳定东北亚的政治情况。因此,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开支必然不可能成为合理的理由藉以减少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

然而,我们一定要考虑第二个疑问:中国真的面临财政资源不足吗?政府开发援助的主要角色一直在给予财政缺乏的开发中国家财政上的协助,尤其是外币的短缺,以便在经济发展初期建立物质基础设施。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个例外,但看起来情况从现在起似乎会有所不同。虽然中国确实遭受财政赤字的困扰,但是,按照国际标准来看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此外,基础建设投资逐渐地仰赖在任何情况都不会短缺的私人基金,。在中国的家庭储蓄在过去几年内已经几乎加倍,在 2003 年底总额达 10 兆人民币(1.2 兆美元)。外汇存底也已经在最近几年急速地累积,在 2005 年 3 月底大概在六千五百九十一亿美元左右 - 相较于 2004 年同时期大约增加 50%。因此,比较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现在面对的是该如何动员这些资源来投资。假定政府开发援助的角色是提供所缺乏的财政资源,中国对传统的政府开发援助的需求一定会减少(2005 年 11 月 1 日)。

## 5.4 重新思考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 (2)

给予中国缺乏的资金需要来建立物质基础设施,日本对政府开发援助焦点的转变似乎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近几年来,它已经开始更注意在结构上的问题,像是环境的退化、贫困、农村发展和人力资源发展。日本是否结束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和如何选择适合的时间点,无疑需要一些政治上的考量和判断力。然而,即使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停止,各种可能性会继续存在,并经过教育交换和训练计划来增加进一步的了解。

一位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者指出,虽然美国并不提供任何的政府开发援助给中国,但是许多华人感激各种由美国大学慷慨地为包括来自中国的外国学生所提供的奖学金计划,而他们在美国学习以及生活的经济大大地提供对美国进一步的了解以及友好的情感。他继续说,撇开不谈敏感的历史议题,如果过去已给予的大量政府开发援助并没有改善关系也没有达到二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对日本将是个遗憾,尤其当没有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国家被人更感激时。

日本能够做什么来探讨这个问题?举例来说,它可以增加与中国对不同教育交换计划的资金,如日本大学所提供的奖学金计划,在中国贫穷乡下地区的中学和高中或大学实行日本语言教育,以及给予已学习日语的学生机会去日本做更高深的研究和进一步了解日本。除了教育之外,日本大致可以为人力资源发展提供合作的空间。举例来说,日本在 1960 年代后期到早期 1970 年代对抗由工业发展所引起的环境伤害有很好的经验。最重要的成就在这个对抗过程期间似乎已经因为提高公众对环境的保护和保持经济发展的注意而成功了。日本可以针对环境计划给予财政资源的帮助或把各种不同与环境有关的友好技术转移到中国,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可

以经过训练计划并借自己的经验来提高中国人民对环境议题的注意。更广泛地说,环境的议题是一个“市场外在性”,而且学习日本的经验并经由试着“使内在化”来了解市场外在性,将对中国充满活力的努力去转换至市场经济非常有用。

我们先前注意到中国现在正面对着动用其公民巨大的国内储蓄来投资的问题。因为日本悠久的历史中有关试着转换其经济结构由外部需求导向到国内的需求导向成长,借机学习日本的成就一定会证明对中国是有益的。虽然教育和训练交换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得到一个成功的结果,如此的计划将为二个国家之间将来的合作奠定良好潜在性。日本的帮助借着如此焦点的转换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最有效的(2005年11月2日)。

## **6.7 对老化的中国将是重要的第 11 个五年规划时期**

在快速老化的东亚之中,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超过 60 岁的人口在 2004 年底为一亿四千三百万人,或占中国总人口数 10%以上。依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年老的社会。此外,由于平均寿命的改善以及在 1970 年后期所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及之后的经济改革,预测估计老化影响中国经济的比例将会是前所未有的。

一项中国国立老龄协会最近的报告指出一些中国独有的特色。首先,老年人口的规模是极大的。一般预计老年人口超过 60 岁分别地在 2014 年和 2026 年将变成 2 亿和 3 亿。在 2037 年将会达到最高点 4 亿人口而且之后将变得稳定(大约总计人口的 30% 将会是老年人口)。其次,由于上述的理由,中国的老化速度比其它的国家快了许多。报告中指出,别的国家需要花费 45 年以上将他们老年人口超过 65 岁的比率由 7% 增加到 14%,而以中国而言,

预计只需要 27 年。第三,一些曲解老化的描述是显而易见的: 男性人口已经比女性人口来得多,而且预期它的差距会扩大。除此之外,老化情形从东海岸到内陆的区域或者是在都市和乡下地区之间是不同的。现在老化的情况在都市和海岸的区域比较快速,但是当移民从内陆移到都市地区发展,在乡下地区的老化亦被预期会快速地发展。

然而,最重要的特点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是,中国不像其它许多的国家,在成为完全已发展而且成熟的社会之前就已变成了一个年老的社会。在许多已开发国家中,包括日本以及欧洲,经济首先变得成熟,因为各种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的理由而老化。换句话说,这些经济可以负担老化的费用,而中国的经济尚未有如此的实力。除此之外,在中国有着强烈的传统与文化认为老人应该被他们的家庭和亲戚照顾,而全国性的养老金和社会安全网依然尚未被完全发展。这意味着中国主管当局处理长期老化议题将会有多困难。

有利的一面是,我们应该注意短到中长期,感谢充足的劳动力,老化应该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任何严重的影响。而确切地说,人口专家指出,感谢人口出生率的衰退,中国应该在往后十年享受“人工红利”。现在 15-65 岁的人口和低于 15 岁的人口分别占了中国总人口的 70%和 15%,这比其它已开发国家高上许多。只有在低于 15 岁的人口比例比许多发展中国家低 – 我们应该注意这些国家,婴儿的死亡率是高的。此外,虽然理论通常指出,当老化发展时,家庭倾向节俭的情况会降低,而在中国,情形是不同的而且许多家庭宁愿试着更节俭来准备老化并考虑到社会安全网的缺乏及他们依然是低收入。

这能够想象是好的或坏的,但是至少它将成为暂时维持投资导向的经济成长。然而,这样子的情况在长期来说将无法维持。当展

望 2006-2020 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确地指出,老化是永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危险因子之一,尤其在重要时期的 2010-2020 年。因此,对中国来说,发展并提升其经济是必要的,而且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期间,准备即将到来的年老社会,当中国仍然可以利用它的人口红利的时候(2006 年 3 月 20 日)。